

# 黑澤隆朝的臺灣原住民音樂調查

文·圖片提供／王櫻芬（國立臺灣大學音樂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圖片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典藏黑澤檔案資料



▲調查團三位成員攝於在臺調查期間，自右至左：梶源次郎、錄音技師山形高靖、黑澤隆朝，拍攝地點日期不詳。

黑澤隆朝（1895-1987）向來被視為臺灣原住民音樂的權威，但是過去很少人知道，他的臺灣原住民音樂調查其實是和梶源次郎（1904-1995）共同在二次大戰期間完成的。

黑澤和梶源是戰時日本公認的兩位南方音樂專家。他們利用太平洋戰爭提供的契機，在日本勝利唱片公司的支持下成立了「南方音樂文化研究所」，並以臺灣作為其第一個調查對象，名義上是為了制定臺灣音樂政策以

作為建立其他日本殖民地音樂政策之基礎，但同時也是利用戰爭尋求研究資源。

該研究所於1942年10月正式開張之後，他們便向臺灣總督府外事部長提出進行臺灣音樂調查的構想。由於當時日本的戰局由勝轉敗，臺灣總督府為了拉攏臺灣人心，正在試圖調整其在臺的音樂政策，因此外事部長便邀請「南方音樂文化研究所」組成一支「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前來臺灣進行臺灣音樂的全面調查。

此調查團主要由三個人所組成，亦即黑澤、梶源次郎，以及日本勝利唱片公司的錄音技師山形高靖。梶源次郎擔任團長，負責事務協調以及音樂之社會文化脈絡的調查，黑澤則是負責音樂本身的調查。他們三人於1943年1月底抵臺，5月初離臺，前後停留三個月。在此期間，調查團得到臺灣總督府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中央官員、地方專家和原住民精英的協助，因此得以完成

日治時期規模最大、內容最完整、且是由總督府主導的唯一一次臺灣音樂普查。

調查團的普查工作，主要由三個階段所組成。第一和第二階段是環島的實地踏查。他們總共踏查了二十一個原住民部落以及臺北、臺南、高雄的幾個漢人音樂戲曲團體（兼及戰時音樂體制的實施情形），涵蓋了原住民各個族群及其分支。唯一遺憾的是，由於戰爭之故，調查團無法搭船前往蘭嶼調查雅美族，也因時間有限而無法調查臺灣西南部的魯凱族。

第三個階段則是錄音和攝影。錄音方面是由黑澤隆朝統籌，由山形高靖負責錄音，並有日本勝利唱片臺灣分部的錄音師協助。他們請各部落駐地警官將十六個原住民部落的表演者和漢人音樂戲曲團體就近帶到鄰近的廣播電臺或錄音室，利用專業的錄音器材進行錄音。

參與錄音的原住民共有一百多人，漢人共有七十多人，可說規模相當龐大。攝影方面則是由梶源次郎率領特別調派來臺的日本映畫社專業技師，到臺南孔廟以及東部的原住民部落進行實地的影片拍攝。在影片中演出的原住民和漢人合計約兩鎮三百人。參與演出的原住民大多為部落的政治領導者、儀式專家（如女巫師）、音樂能力突出



▲臺南市長為調查團特別重現釋奠禮佾舞的場面（攝於1943年3月27日）。當天佾生皆著國民學校校服。

者，以及青年團成員，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原住民精英。漢人則主要是經常在廣播節目中擔綱的臺北同志音樂會成員，加上藝旦和票友，還有南部的以成書院和南北管樂人以及高雄的張叫皮影戲團，另外也包括了佛教及道教人士。

調查團總共採集了270首左右的樂曲（包括踏查和錄音所得）、21幕（scenes）影片，收集了樂器、文物、田野紀錄，以及其他書面資料，並進行了



▲黑澤隆朝和梶源次郎在賽夏族十八兒社實地踏查時與大隘社演出人員合照（攝於1943年3月18日）。

▶調查團映畫班拍攝阿美族田浦／南浦／舟津三社合演之月見舞（豐年祭）的紀錄片場景之一（攝於1943年4月11日），攝於舟津海岸。

157個原住民部落的樂器普查，普查的方式是由在地的警官填寫問卷。

調查團在五月初抱著性命危險返回日本後，在六個月內完成了26面78轉唱片和10片紀錄片的編輯工作，並於該年年底向日本學界公開其展現調查成果。不幸的是，1945

年3月的東京大空襲，炸燬了調查團所完成的唱片和紀錄片，以及在臺灣所採集的部分資料。幸好黑澤家中還留存了一套編輯用的26張唱片，還有其他部分資料也得以倖免於難。

這些殘存下來的資料，成為黑澤日後發表有關臺灣音樂之相關著作的基礎。1951年，黑澤和梶源次郎將26張唱片濃縮成12張78轉唱片，寄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以及國際民俗音樂學會（IFMC）。接著黑澤又在1953年的國際民俗音樂學

會會議中發表論文，提出布農族和聲來自弓琴泛音的理論，引起歐美音樂學者對臺灣原住民音樂的注意。隨後上述12張唱片中的數曲也陸續被收錄於歐美日發行的數套世界音樂及城中，讓臺灣音樂首度揚聲國際。

1973年，黑澤將其1943年之原住民音樂調查的過程和成果整理出版為專書《臺灣高砂族の音樂》。1974年，黑澤又將26張唱片中的原住民音樂曲目重新編輯成一套兩張唱片《高砂族の音樂》，由日本勝利唱片公司出版。

由於黑澤的書和唱片，是首度以文字和聲響完整呈現臺灣原住民各族音樂的多元面貌，因此一向被奉為經典。但是由於原住民音樂在殖民統治和現代文明的衝擊下已經產生許多變化，因此黑澤的書和唱片更重要的意義，或許是在於它們為日治時期原住民音樂的變遷情形留下了珍貴的紀錄，值得我們繼續探索。

